

数字时代的
文化生活

《李有才板话》——

对人民有益 受群众欢迎

罗 扬

品味
红色经典 ⑱

我认识赵树理是在1951年的秋天。当时赵树理任中国曲艺改进会筹备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已经是赫赫有名的大作家。我是一名年轻的工作人员,但他非常诚恳谦虚,对我没有一点架子。当我谈起《小二黑结婚》《李有才板话》等农村题材作品多么精彩时,他谦逊地说:“我对农村有感情,也真想写点合乎老百姓口味、又对他们有帮助的东西,可是,这不容易啊!我做得还远远不够,我的才能还不高。”而后提及民间文艺,特别是农村说书唱戏的情况,他兴致高了起来,时而双手敲打桌子,时而手舞足蹈,毫无顾忌地唱起了上党鼓书和上党梆子,在场的人都乐得前仰后合。

新鲜、健康、简朴,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

在赵树理创作《李有才板话》之前,太行山区正掀起声势浩大的第三次减租减息的高潮。赵树理下乡,本持有检查减租减息的任务。但他在调研中发现地方上一些青年工作人员不谙农事,不了解农村的实际情况,也没有深入群众调查研究,以致一些好政策在落实过程中受到影响。就像赵树理说的那样:“我在做群众工作的过程中,遇到了非解决不可而又不是轻易能解决的问题,往往就变成所要写的主题。”于是,便有了这部《李有才板话》。

《李有才板话》通过山西农村一个叫阎家山的地方改选村政权和实行减租减息的故事,反映抗战时期敌后根据地农民的实际状况和真实心声。小说不仅讲活了减租减息的土地政策,而且深刻阐释了农村革命干部只有坚持群众路线,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让党的正确路线、政策与广大农民真正结合在一起,才能解放农民,团结更多革命力量。

茅盾曾经这样评价《李有才板话》构思的精巧,特别是对快板这一新鲜手法的匠心运用:“在若干需要描写的地方(背景或人物),作者往往用了一段‘快板’,简洁、有力而多风趣。”“我们试一猜想,当这篇小小说在农民群众中朗诵的时候,这些‘快板’对于听众情绪上将发生如何强烈的感应”。郭沫若看完小说后也赞叹不已:“我完全陶醉了,被那新鲜、健康、简朴的内容与手法;这儿有新的天地,新的人物,新的意义,新的作风,新的文化,谁读了我相信都会感兴趣的。”

《李有才板话》甫一问世,就成为解放区文艺的代表之作。小说单行本连出三版都很快销售一空,买不到的人到处借阅,争相传诵。有人说这部作品给文艺界注进新的血



图①为作家赵树理。图②为美术家罗工柳为《李有才板话》创作的木刻插图,曾与小说一起在1946年延安《解放日报》上连载。图③为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的《李有才板话》封面。
制图:赵德汝

液,有人说读过这部作品之后,对解放区团结协作的幸福生活更加向往。小说在报纸上连载后,有读者给报社写信:“像这样优秀的文艺作品,如果能广泛散发,深入农村,将起到更大作用。”在后来的整风学习以及更大范围的减租减息、土地改革中,《李有才板话》成了干部必读的参考材料。干部们不但自己学习,还把它念给农民听,反响异常热烈。农民群众一边听得乐不可支、哄堂大笑,一边联系实际,“对号入座”,参照小说中的工作方法来解决本村的实际问题。

“一定要拿起笔来就想到这是为谁写的”

《李有才板话》受到欢迎,很大程度上要归功于赵树理的“群众路线”。

赵树理是山西晋城沁水人,来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他有丰富的农村生活经验,深切懂得农民的甘苦和情感。尽管后来到了北京,担任多个文艺团体的重要职务,但他依然保持着农民儿子的本色。

在20世纪50年代,赵树理是作品发行量最大、稿酬最多的作家之一。但除了家庭生活等必要开支,他把绝大部分钱都用于支

农村建设和缴纳党费。平日里赵树理经常披一件从太行山带来的破旧棉大衣,喝廉价的砖茶,和赶大车、蹬三轮的老哥们挤在一起,来一碗浇着香油、辣椒油、芝麻酱的老豆腐,吃得津津有味,聊得心满意足。有一次,赵树理因为工作生活需要,想去买块手表。他到商店里一看价钱,连忙摆手:“够农民买五头驴啦!”后来总算在天桥的旧货摊上淘到了一块便宜表,赵树理将其命名为“三勤牌”,因为它必须勤上弦、勤对点、勤修理。这只表陪伴了赵树理多年。

赵树理说过:“我们的文艺是为人民大众服务的,要服务好,一定要拿起笔来就想到这是为谁写的,让人喜欢读、喜欢听,对人民大众有好处。”他特别注重文艺对农民精神世界的影响:“写小说和说书唱戏一样,都是劝人的,要劝对,而且要使人愿意听你劝。”

因为熟悉农村农民,他笔下的农民形象生动鲜活,通过人物自身的语言、行动,三言两语、举手投足间,就让人觉得真实可感——“他笔下的农民是道地的农民,不是穿上农民服装的知识分子”。赵树理既懂得农民的心理和感受,又了解农民的审美情趣和阅读水平。为了让老百姓更好地理解作品,赵树理尽量挑选农民能听懂的语言。凡是老百姓不常用的词句,他在写作时就尽量避免。用他自己的话

来说,就是要用“活在群众口头上的语言”。

有人说赵树理是个“土作家”,不懂外国的艺术。这是误解。赵树理不仅读过不少外国文艺作品,而且对照中国小说的写法做了比较研究。他多次和我说,某某人物、某某场面,照西洋小说的写法是如何,照中国小说的写法又是如何。他认为,我们对外国的东西要学习、借鉴,但不能简单模仿,要化为己有,要“中国化”。

让新文艺与民族民间文艺的传统相衔接

“阎家山,翻天地,群众会,大胜利。老恒元,泄了气,退租退款又退地。刘广聚,大舞弊,犯了罪,没人替。全村人,很得意,再也不受冤枉气,从村里,到野地,到处唱起‘干梆戏’。”

在《李有才板话》的结尾处,李有才应工农干部老杨同志的请求,为当地农民与地主阎恒元展开的斗争编了首快板。通过这首朗朗上口、活泼生动的快板,农民重获土地的喜悦之情扑面而来,土地政策给阎家山带来的深刻变化,也传神地表达出来。

《李有才板话》的成功和赵树理对民间文艺营养的吸收转化有很大关系。赵树理对我国民族民间文艺,尤其是对农村中长期流传、为广大人民群众喜闻乐见的曲艺和戏曲艺术有着深厚的感情。他常以《三国演义》《水浒传》等古典小说和同名的说书、大鼓作比较,阐发二者的密切关系和曲艺艺术成就,希望我们的新文艺更好地与我国民族民间文艺的优良传统衔接起来。

赵树理在担任新中国第一个曲艺刊物《说说唱唱》主编时,收到过一篇业余作者的来稿。文中有许多错别字,有些地方画了一些符号,谁都认不出。有同志看过后打算退稿,但赵树理一字一句费力地看完稿子,觉得虽然有些地方粗糙,但内容充实、语言生动、乡土气很浓。经过他仔细的编辑修改,文章在刊物上发表,引起很大反响。之后赵树理还给作者写了一封长信,指出文章的优长和不足,并列了一大串书名,鼓励这位作者深入阅读、继续写作。这位“业余文学爱好者”就是后来创作出《淮河边上》《风雷》等长篇小说,担任过中国作家协会顾问和安徽省文联名誉主席的作家陈登科。

赵树理不止一次地叮嘱编辑,一定要满腔热情地对待工农兵出身的业余作者。他们文化水平低,但熟悉生活,有真情实感,语言生动,在曲艺创作上很有优势。对他们的来稿要仔细提出修改意见,帮助他们提高思想文化水平和写作能力,千万不要嫌他们文化水平低,挫伤他们的积极性,要知道未来好的作家可能在这些作者中间产生。于是,认真对待来稿、热情对待作者、注重发现新人新作,成了《说说唱唱》编辑部的优良传统。

今年我已经92岁了,依然笔耕不辍,经常写一些曲艺界过去的事,过去的人,在这个过程中经常会想到赵树理。赵树理讲的“曲艺是普及的艺术,也是高级的艺术”,影响着包括我在内的几代曲艺工作者的成长。赵树理坚守的“对人民有益,受群众欢迎”的创作原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宝贵经验。

(作者为中国文联荣誉委员、中国曲艺家协会名誉主席,本报记者任飞帆根据采访和资料整理)

文学之树何以长青

艾 斐

成为抗日根据地宣传和推行土地政策的生动材料,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对敌斗争的有力武器。

在文学上,赵树理用老百姓耳熟能详的语言创造出自己独特的写作风格:诙谐生动、清新刚健、泥土味浓、故事性强、人物性格鲜明、细节描写逼真、表现形式活泼。每一篇作品、每一个人物、每一句话,都像刚刚从生活的池塘里捞出的鱼、采出的菱、掏出的藕一般,鲜嫩嫩、活溜溜的!识字的可看得懂,不识字的也能听得懂,并且一看一听就入迷。赵树理的作品也成为“山药蛋派”文学的典范。

在《李有才板话》中,赵树理以喜剧化的人物形象和幽默风趣的语言特质,给读者以畅快淋漓的阅读体验,吸引读者进入到那个时代的生活。李有才爱讲笑话,会编“吃溜嘴”(快板),生活虽清苦,但“有才好像一炉

火”,团结贫苦的农民,他的破窑洞也成为大家聚在一起、充满欢乐的地方。同时李有才有着冷静的头脑,对农村现实了解得很清楚,有斗争意识。“快板”是小说故事演绎和情节推进的重要载体,更是李有才团结群众打击地主的武器,他们一次次地同地主进行“智斗”,并取得胜利。有说有唱、夹叙夹议、生动活泼的快板诗,同在斗争中成长起来的新一代农民形象相互辉映。这些农民除了具有敦厚、善良的美好品质,还敢于与剥削人民的地主作斗争,不向恶势力低头。他们展现出来的新的精神面貌,也成为时代风貌的生动写照。

不仅是《李有才板话》,包括《小二黑结婚》《李家庄的变迁》《三里湾》在内的一系列创作,赵树理都始终追求“老百姓喜欢看、现实中起作用”的目标。对赵树理来说,这不仅是一种追求,更是一种情结,因为在他的心中

劳苦大众、普通百姓是最重要的。

当长篇小说《三里湾》行将完稿之际,赵树理婉言谢绝了好几家大出版社,把稿子送到一家规模较小的通俗文艺出版社。为什么不选名气大、稿酬高的出版社呢?赵树理说:“我不管这些,我只知道这个小出版社是专门面向广大群众的。至于稿酬高低,那更无所谓,我倒是希望给我的稿酬再低一些。因为稿酬低了,书的成本就低了,定价也就相应的便宜了,这样一来,不就减轻了群众购书的经济负担么!”

这就是赵树理。他在文学与大众之间搭起了连心桥。评价一个作家的价值离不开一把尺子,那就是人民。只有和人民在一起,才能经得起时间考验,文学之树才能长青。这也正是我们今天重读赵树理的启示与意义。期待反映这个时代的优秀作品不断涌现,为后人留下新时期的经典。

完善算法技术,规范算法应用,才能让科技更人性化地服务社会,让数字文化生活更多彩、更美好

今天,科技似乎变得越来越“懂”你:打开购物网站,近期想要购买的货物都已被推荐到首页;进入短视频平台,一条紧跟一条推送的恰好是你喜欢的视频内容;就连新闻信息也依着你的兴趣推送眼前……这一切,正是依靠日渐成熟的算法技术得以实现。

算法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大数据技术的关联节点。在移动互联网上,社交媒介、定位技术、搜索引擎等给用户日常生活提供极大便利的同时,也实时生成和储存着大量相关数据。正是在海量数据基础上,人工智能技术对用户的兴趣爱好和需求进行推断,描绘出不同的用户画像,打上特性“标签”,进而以此为依据,进行精准的文化生产与个性推送,实现数字文化从生产、传播到接受的全程个性化、精准化定制。

从积极意义上说,算法在不断迭代更新的技术推动下,成为文化领域供给侧改革的推手。过去,文化供给对受众文化层次、审美兴趣和文化需求的差异了解得不够,更多是从投资方、创作者角度进行生产,导致一些文化产品并没有很好地对接受众需求。

但如今,伴随互动技术的普及与迭代,通过参与式的文化互动,人们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文化需求。通过用户关注、订阅、浏览、点赞、评分、评论、弹幕、转发、收藏等行为,产生关于文化产品接受的大量数据。这些数据被各类信息平台视为重要资源,用以描绘用户画像、分析行业趋势、进行投资决策。比如,影视公司根据购票平台、评分网站的数据,规划新作品的题材类型与演员搭配,提前做好“话题梗”;短视频平台根据用户的停留时间、观赏偏好、点赞评论,有针对性地向其推荐相关内容;网络文学网站通过对用户订阅习惯的分析,进行作品推荐,生成个性化页面。算法以“更懂用户”的技术优势,不断进行业态创新和服务创新,助力文化领域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

作为一种新技术,算法还对缓解信息过载、提升数字内容分发效率发挥着积极作用。算法推荐技术帮助用户筛选过滤,形成高匹配度的专属定制内容,降低了信息选择的成本。

不过,由于算法建立在大数据采集基础上,技术的不完善和人们使用的不规范,也给算法应用带来隐患。算法基于用户过去行为来预测未来偏好,并以此为基础进行内容生产和分发。如果过度依赖技术,以其为单一价值维度,忽视文化创造的规律,那么算法在为打开兴趣偏好大门时,也会屏蔽其他内容,让人们陷入同质化的信息流。推荐服务越是精准“定制”、精准“喂养”,越容易导致人们被封闭在同质化信息所建造的“茧房”中,使个体对文化产品的自主选择日渐递减,不同兴趣的人们彼此疏离,难以形成文化共识。

算法技术面临的这些问题并非不可解决,根本在于对这些问题的认识,并积极改进。要避免算法技术对个人认知、群体交流以及文化生态带来的负面影响,就要加强技术的价值重塑。文化企业要承担起文化责任,增强对算法技术的完善,融入多样价值维度,让更多样的文化内容能够被“看到”。对普通个体受众而言,需要提高信息辨别力,发挥主观能动性,有意识地强化文化选择的自主能力。完善算法技术,规范算法应用,才能让科技更人性化地服务社会,让数字文化生活更多彩、更美好。

完善算法技术 规范算法应用

郑焕钊

